



喧闹的海市

闽 东 南 港 市 兴 衰 与 海 洋 人 文

蓝达居\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洋 国
海 与
中

丛书



喧闹的海市

——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

蓝达居\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杨国桢 主编

海 洋
与
中 国
丛
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喧闹的海市: 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 / 蓝达居著.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9.12
(海洋与中国丛书 / 杨国桢主编)
ISBN 7-81033-955-9

I. 喧… II. 蓝… III. 地方史—研究—福建—港市—明清时代 IV. 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1659 号

海 洋
与
中 国

喧闹的海市

——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

蓝达居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 330046 电话: (0791) 8512093 850431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恒达科贸有限公司照排部照排

封面印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内文印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850mm × 1168mm 1/32 10.125印张 190千字

印数: 1-2000册

定价: 25.80元

ISBN 7-81033-955-9/K · 40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1.8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万余公里的岛岸线,沿海岛屿6500多个,5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30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国土的1/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挫折。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视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

21 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植基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

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累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

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份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造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 21 世纪!

楊國楨

1998 年元旦

致读者

本书所叙述的是有关港市的故事。

为什么是港市？为什么是闽东南？为什么是海洋人文？这是在翻开本书之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

港市的故事，有不同的叙述模式。

史学界既有的关于闽东南港市的研究与探讨，尽管基本上只是各港口的单体研究，但探讨了各港口地理与社会经济、管理及社会关系诸问题，提供了有关各港口历史诸方面的认识，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的基础。不过，我们愿意指出，既有研究所存在的较多的局限而致我们尚未能拥有关于闽东南港市历史发展方面的充分认识。这主要表现于，首先这些研究绝大多数属于港口单体考察，而缺乏有关整个闽东南沿海港市发展的整体性综合考察之尝试。独立的单体考察自然难于观察整体性的联系，难于观察到整个区域港市发展的全貌。其次，就某一港市之研究而言，其所涉之层面亦不全面，而多集中于航运或贸易方面，而港市意识形态方面之探讨相当罕见或不见，因而不能说是一种关于港市的全面分析。再次，由于考证之欠缺，致使在运用史料上存在张冠李戴之现象。

而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港市未能成为一种史学研究的对象，而是被无意识地作为其他层面研究之附庸来处理。这造成了贸易研究取代港市研究的普遍现象。¹造成这种局面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应用有着密切的联系。面对这种研究状况，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进行新的思考。

我们需要提到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施坚雅的解释模式。施坚雅教授关于中国城市史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是以中心地学说为基本指导性理论框架的，但又不囿于成见而有所突破。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差异性极大，他按城市建设地理，把中国分为九个大区，每个大区又分为若干子地区，从区域的角度分别考察各大区的城市化历史过程。施坚雅教授认为，每一区域的主要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域通向核心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上。而且，在同一自然地理区域中的所有城市（包括集镇）构成层次不同的交往关系，以一个或几个地处核心区的城市居于这种层次的顶点，这种布局同市场最优原则、行政最优原则也是一致的。这些城市只是在一体化的中心地等级结构中居于较高层次者，其下还有一般性集镇，每一层次的经济中心地都在更复杂而庞大的经济体系中起“中心点”的作用。处于每一层次上的这种经济体系都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与下一个较高或几个较低层次的体系相连。所以，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但却是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只是

边缘地带较核心地带松散些。因此，中国历史结构是一个由网络连接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所组成的层次结构，它的作用范围体现在人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在每一层次上，某一特定的区域体系的关键时间结构都是持续不断的周期的“插曲”。施坚雅指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与王朝的政策、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天文变化有关。他提出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周期可能是完全不同步的观点。他以东南沿海区域同华北区域作为一对参照物来论证自己的观点。²施坚雅模式从区域史角度来理解中心城市的兴衰，对于我们的研究是深有启发的。不过，按照他的解释模式，我们似乎仍未能深刻地了解到既是城市又是港口的港市的特殊性之所在。我认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提出，为追求以海洋为舞台的真实历史，为港市海洋人文特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刺激。

二

海洋人文问题终于浮出海面。

但是，我们有一种学术的不幸。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人文过程的研究不幸曾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成为西方人文研究的一种“分述”，成为西方社会单线演化论的一种中国式论证，并成为西方中心论的无意识体现——尽管人们主观上有意反对单线演化论，但在学术实践中又不自觉地落入它的窠臼。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本土人文的研究，对中国

人文变迁的探讨,是在具有西欧中心论倾向的“东方学”范式中进行的;对中国内部区域人文的研究,也往往是在“中原中心论”的范式中进行的,这导致了区域海洋人文传统淹没在中原人文传统之中,造成了中国海洋人文的失忆现象。中国人文在研究中失却了内部的多样性。这也造成海洋人文研究在史学界的长期缺席,造成了人们对海洋人文的不自觉。

幸运的是,西方“东方学”和汉学所具有的西欧中心论倾向很早就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批评。我国史学家向达指出:“西欧资产阶级东方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荷兰的戴闻达所说郑和航海图是以阿拉伯人的地图为蓝本云云,那全是臆测之谈,举不出何种证据。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贬低中国人的智慧和科学水平,进行诋毁而已!”³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也说:“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发现的中国内河船只的数目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海军在1100年~1450年之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⁴批判与反思促成了对中国海洋人文的探索与发现。随着西欧中心论偏见和“中原中心论”偏见的瓦解,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结构特征,⁵中国传统社会过程也迥异于其他社会过程,体现为“另一种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海洋性构成了中国人文结构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海洋人文是中国文化中最古老的基层文化,它发生和成长于海

洋区域。⁶事实上,中国人很早就投入海洋,有自己的海洋发展人文传统。⁷

实现中国海洋人文的历史自觉有赖于中国海洋人文研究概念系统化的努力。以历史自觉为己任、作为人文基础学科的历史学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出现了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学术动向。这一动向意在阐明:中国不但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且是一个海洋国家;不但有极其悠久的大陆文化,而且也有极其悠久的海洋文化。中国海洋人文的出现与中国大陆人文同样古老。而且,中国的海洋人文传统与大陆人文传统处于辩证的历史关系之中,互动整合成中国社会人文的体系。在这一深刻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变迁的学术动向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展现了独特的新视野和学术魅力,代表着中国史坛从“陆地”走向“海洋”这一研究方向的概念系统化努力。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杨国桢先生对在中国社会多元结构中,海洋社会经济以及海洋人文的性质和地位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提出并界定了“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等一系列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科概念和重要理论思路。⁸他认为,海洋社会具有多样性、有其不同的区域性特征、历史特征和民族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属于海洋社会人文类型,但海洋社会未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海洋社会是植根于传统农业、以远洋贸易为目标、“以海为田”发展出来的相适应的社会经济体系和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和思

想文化意识的统一体；中国大陆农业人文与海洋人文具有相互包容性。农业社会与海洋社会有联系而又有区别，二者的辩证统一是研究和把握从农业社会向海洋社会转型的关键。他主张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立足于中国，以比较世界史的观点来探讨东西方社会通过海洋交往而发生的互动整合过程。他强调以“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重新思考“海洋历史”与“陆地历史”的关系，重新评估“海洋历史”在中国历史人文中的地位。在探索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架构的基础上，杨先生又提出“海洋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任务。⁹

海洋人文是一定时空座落中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以海洋生态区域为生存发展活动空间，在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海洋经济和社会活动以及相关的海洋事务中形成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人文类型，包括海洋经济体系、海洋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海洋意识形态，是人们在海洋生态环境中发展的一种生命形态，是完整而复杂的社会文化体系，而且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并依然是我们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

海洋人文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将海洋人文视为科学研究对象。海洋人文概念的提出，其目的在于重新思考“海洋人文”与“大陆人文”的关系，重新评估海洋人文在中国人文中的地位。当我们赋予海洋以丰富的社会人文的内涵时，我们所做的将不仅仅是对“海洋”历史本身的重新认识，而是重新评估一系列的社会人文关系，重新评估海洋在中国传统社

会的边际性边缘性角色，确立中国海洋人文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中国海洋人文的历史自觉不是停留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学科的建构上；它更意味着中国海洋人文传统资源因应社会需要的现代转化以及在人文传统引导下的现代海洋人文的创造。它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学术理论思考，更重要的，它是广大国民在历史感召下的广泛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走向海洋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内容和发展目标。正是在回应这种社会实践的意义上，中国海洋人文的历史自觉凸现其深刻的现实性。

三

海洋人文的发展依托于一定的时空座落。如果将中国海洋人文的时空座落划分为沿海区域、沿海岛屿以及海外发展区域，则沿海区域中的港市是海洋人文活动最集中、最经常、最活跃发生和进行的地方。事实上，沿海港市的社会活动是海洋人文发展中极重要的环节，最关键之所在。

闽东南就是这样的“沿海区域”；闽东南港市就是这样的港市。闽东南泛指福建闽江下游及晋江、九龙江、木兰溪等流域。明清时期共设有四府一州，即福州府、泉州府、漳州府、兴化府及永春州。这一地区有福建的四大河口冲积平原，人口稠密，社会经济人文发达，是我国海洋人文活动较为活跃的关键区域。¹⁰这一区域面对台湾、邻近港澳和东南亚，

属于上海与香港、台湾之间的要冲之地，扼东北亚与东南亚航运的要冲，与亚太地区的海上联系十分便捷。它成为我国海洋人文活动较为活跃的关键区域。海洋性是闽东南区域社会人文的结构性特征。该区域因其自身的自然社会历史特点而形成区域性的人文模式，即海洋人文传统。该传统以其悠久的历史、民众参与的广泛性、活动空间的广阔性及坚忍的航海精神而树立了其在中国海洋社会人文中的代表地位。这一区域的海洋人文成就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的呢？区域海洋人文发展的机制何在？

历史上，福建与海外的人文联系，福建人的海洋活动，主要是以集中于闽东南沿海的港口或港市为基地而得以展开的。这些港口得益于其优良的靠泊、避风等自然及社会人文条件，并处于古代国际海洋交通运输和国内航运线路上，是具有国际级或国家级区位的港市。从海洋人文发展史的角度看，沿海港市，作为海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社区，它对于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运作实具关键性作用。港市既然是海洋人文活动最集中、最经常、最活跃发生和进行的地方，则探讨区域海洋人文，其逻辑的起点自然是沿海区域中的港市。透过港市，我们可以把握区域海洋人文的基本特征，并进而深刻洞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本质。

港市运作为海洋社会经济运作体系的基本构成，因而主导或影响港市盛衰的力量，也即是主导

或影响整个区域经济体系运作的力量。因此，港市研究必须揭示这些影响港市盛衰发展的各种因素。那么，是何种力量主持着港市的操演运作呢？在港市兴衰的表象之下，影响港市运作的各种力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各种力量又是如何消长的？这些问题在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史学中必须予以追问、解释和再解释。

四

港市海洋人文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社会文化体系，而港市的社會構成及其經濟活動及內蘊的心態以及港市的興衰則是港市海洋人文研究的基本內容。要科學地認識港市，需要有新的學科理論和研究範式。本書即試圖在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框架內對閩東南中心港市進行歷史人類學的探究。歷史人類學具有自我反省的作用，批評傳統史學中的“中心論”，研究人的“日常生活”，人們的飲食起居、姿態服飾、風俗習慣、技藝和文化。它自覺發掘沒有被“官方”或正統史家記載的歷史，即由於沒有發言權，因而不能成為“官方”或正統史學模特兒的人創造的歷史，也即下層民眾的歷史，讓“沉默的大多數”發言，它同時需要對歷史文本寫作方式的批評。歷史人類學有助於我們糾正對中國海洋人文發展史的嚴重誤解，有助於我們傾聽被壓抑的海洋人文歷史的喧鬧之聲。

本書的研究，以港市為切入點，探討明清區域港市的活動周期、發展動力、人文互動、文化實踐、

内部结构及其文化诸层面，以期能够形成关于闽东南港市及其海洋人文的新的认识。在第一章，我讨论了作为分析工具的港市概念以及闽东南港市发展的自然基础。在第二章，我较为全面而概括地叙述了闽东南四大港市发展演化的总趋势，藉此为后文的有关讨论分析提供一种历史深度。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试图对闽东南港市的兴衰成败动因作出新的解释。我认为，重新检讨原有的关于闽东南港市发展之种种假设是合乎情理的和必要的。在这些假设中，有两项在有关研究中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是认为福建封闭的内陆地理特征，促使闽人向海洋发展，从而有港市兴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是认为福建沿海地区人多地少，资源有限的人口决定论。要检讨上述假设，必须充分考虑三种因素对于区域海洋人文实践的影响。这三种因素是：1. 闽东南民间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传统；2. 国家权力体系的运作影响；3. 世界体系的力量渗透影响。在明清闽东南港市发展过程中，上述这三种因素分别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港市海洋人文的运作？在第三章，我试图从海陆人文互动的角度考察民间实践传统与世界海洋人文因素对闽东南港市的影响，而在第四章，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来探讨国家权力体系因素与民间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对港市兴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试图回答在多种力量交互作用下的闽东南港市发展的特征何在。在第五、六、七章，我分别从经济、社会、思想心态三个层面来讨论港市海洋人文的基本形貌。在结语部分，我对闽东

南港市发展的模式作了一些思考。

五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信徒，选择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我进一步深造的方向，这并非出于对人类学的反叛，恰恰相反，乃是因为杨国桢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从其学术立场上言，具有强烈的人类学色彩。他主张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人文视为完整的体系，主张从民间层面而非官方态度去看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主张多学科研究的态度，这种观点是极具学术想象力的，因而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在我看来，包容着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充满着科学的魅力，值得我们去拥抱它。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业师杨国桢先生在指导博士论文的写作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没有他的指导和鼓励，我是没有勇气和信心去完成这一研究任务的。他治学风格严谨，为人随和幽默，视野气势磅礴，思维朝气蓬勃。愚生虽本性拙钝不敏，然幸蒙先生谬爱，错收为徒，始得沾染大气而缝窥历史大千世界。又常困顿于学术之途，而多得先生妙手，指点迷津，乃能破雾前踪。学生从人类学背景步入历史之天地，先生鼓励我抛开背景大树遮罩之阴影，蹈舞于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出入于历史与现实之境。然学生实在懵懂未悟，又心怀浮躁，故至今未得要领，不能挥舞，只能滚爬，难孚厚望。惭愧与苦闷，